

保守的浪漫

■本报见习记者 吴益超

曾经是上海天文台最年轻的研究员,如今是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同时还兼顾专栏写作、书评、性学、文学及科幻研究,很难想象众多领域的不同身份,竟能集于 58 岁的江晓原一人。

而自认为“智力中等”的他,生活心态或许正趋近于某种平衡——每天读书,乐于分享新知,并探索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有原则的“80 分”

他喜欢用“不务正业”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尽管这是个贬义词,也有人据此认为江晓原有些“自鸣得意”。但江晓原坚持一个原则:不妨碍主业。

江晓原提到经济学的“边际效益递减律”:“通俗地说,就是比如学好一门课的 80 分需要 100 小时,学到 90 分就需要 200 小时,那能不能换个角度想,花 200 小时学两门课的 80 分?”

1988 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后,江晓原在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工作了 15 年,40 岁之前,“科研成果、研究员职称、博导,该有的都有了”,他又开始思考自己正业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在江晓原位于上海的家中,有藏书 3 万余册、藏电影 5000 余部,难以想象这是天体物理专业出身人士的“私人图书馆”,这让不少好书之人颇为羡慕。喧嚣都市之中,宁静小楼之上,江晓原在书的世界里无尽遨游。

而这些都成为他写作的重要来源,除了著有《天学真原》、《随缘集》、《天学外史》、《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等几十种书籍,江晓原还长期在《文汇报》、《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文汇报》、《南方周末》、《新发现》等报刊杂志撰写个人

专栏,并任《我们的科学文化》丛刊主编。

但江晓原却不喜欢用“表达”这样的词汇形容向他人传递知识的过程,他更希望用“分享”来解释。

“我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江晓原说,“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未尽相同。”他人分享知识并不是什么崇高的使命,也不需要“表达”这样的高姿态。

浪漫主义混合理性思考

“你有如此的经历和精力,为什么会自称‘智力中等’?”记者问。江晓原认为,自己的知识广博和“智力中等”并不矛盾,他认为用“机缘”这个词更能解释这些。

生于 1955 年的江晓原,少年时光在“文革”中度过。但他却是幸运的,因为某种“机缘”,他浏览了不少古典与近代、中国和西方的书籍。尽管那个时代读书活动式微,但高考一经恢复,坚持学习的人就容易在大浪淘沙中脱颖而出——1977 年,有着 5 年多工龄的“老工人”江晓原成为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的本科生。

在当时,江晓原周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年轻人会选报文科专业。多年后,江晓原在博客中描述他当时的心境:“为什么非要学理科,倒不是因为我喜欢理科,而是因为我一直幻想要成为一个文理兼通的人。我甚至隐隐知道我最终会以文科为业。”

随后,江晓原慢慢忆刻着自己“行走在文理交界上”的人生轨迹。打开他的新浪博客——尽管这个博客因为只贴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被他自己称作“伪博客”——江晓原会拉上你“温柔地清算科学主义”,探讨科学与文化的关系;又会唱唱“南腔北调”,比如“科普应该加入反科学主义”之类的论调;甚至还会穿越百年,给牛

顿写信。

“文科有浪漫主义的发散思维,理科有理性思考的缜密逻辑。”而这两者的混合,或许正是江晓原在上海天文台的时候,能够承担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专题”的原因。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但这样的一个江晓原,在面对“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iPad 等一些新事物时,却有着谨慎而保守的态度,尽管他的新浪博客的累计访问量已经突破了 261 万次。

2013 年 2 月 24 日,对犹他大学莫兰眼科中心项目主任付银斌博士来说是难以忘却的一天。这一天,作为来自全美各高校的 10 名专家学者中唯一的华人,付银斌在美国马里兰州波托马克博尔格会议中心,获得了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分支机构美国国家眼科研究所颁发的“规划美国未来十年眼科研究方向的竞争大奖”奖金和证书。

中科院院士杨焕明称付银斌为华人之荣光,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付银斌有一把“分子剪刀”。

重获光明的力量

得益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发,付银斌开创性地提出了“基因修复法”,即用通过精确制导的分子修复技术,用一把“分子剪刀”除去那些容易产生病变、不良的基因,在突变位点将其换为健康基因。这亦与今日个人基因测序费用的降低不无关系,付银斌希望,通过“分子剪刀”的修剪,能够将疾病基因在产生初期就消灭掉,防患于未然。而已经得了眼病的患者,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掉坏的基因后植入好的基因,以达到治疗效果。此番付银斌获奖,美国不少业内人士称其为“实至名归”。

对于祖籍中国的付银斌来说,仅仅在美国“建功立业”是远远不够的,他的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眼科中心、北京 301 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四川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等著名眼科医学机构均有交流与合作。

“中国同美国类似,患眼病的人数量巨大,双方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合作潜力,我希望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解除眼病患者的痛苦。”

付银斌说,让盲人拥有重获光明的力量,始终是自己多年研究的美好愿景。

荒漠之外,绿洲之中

犹他州于 1896 年成为美国的第 45 个州,与付银斌出生的湖北有着秀水青山不同,这里由落基山脉、科罗拉多高原和大盐湖沙漠所盘据,充满着美国西部独有的原始、荒凉与空寂。

付银斌 2007 年 8 月来到美国犹他大学眼科系,并在这里创办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实验室(以研究神经科学为主),并成为该校眼神经科学攻关项目的负责人。而在这之前,付银斌就已经将眼科科学研究视为自己心目中的绿洲了。

1991 年 7 月,从北京大学生化专业毕业后的付银斌,在美国学习工作一段时间后,受聘于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并在姚金外(音译)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

付银斌的努力很快得到回报——2003 年,他就以并列第一作者的身份,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视觉蛋白在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光传导的作用》。不久后,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另

一篇论文《感光视网膜神经细胞通过黑素蛋白感光》,对于结束当时科学界关于新发现的自我感光视网膜神经细胞使用何种光敏蛋白的巨大争议起到重要作用。

据了解,自我感光视网膜神经细胞的发现,被评为 2002 年科技界十大发现之一,该重大贡献正是由付银斌所在的姚金外实验室作出的。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是王维《过香积寺》的末两句,被江晓原借以形容自己看待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的想法:“毒龙”指垃圾信息,它们令人妄想丛生、邪念蜂起,“安禅”意喻远离之,就像他认为,乔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毒苹果”,我们必须远离之。他甚至将自己在《文汇报》上的专栏取名为“安禅制毒龙”。

江晓原说:“现在的诱惑太多,人怎能静下心来读书?”为了远离“没有用的信息”,他甚至不看电视,基本不看畅销书,了解新闻则主要通过报纸。江晓原还告诫年轻人:要以“out”为荣,以追赶潮流为耻。

持这样观念的人,是不是过时了?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或许只愿意挤进热闹的人群,让感官沉迷于网络,收获各类情绪,并奢望心灵能得到片刻安宁。

但江晓原正尝试着提醒人们,在这种“主流”观念之外还有些什么:人们通过安静读书,能够将心灵从蜷缩的角落中释放出来。或许效果微乎其微,但他仍希望至少让我们了解:“在地铁上用 iPad 读亚里士多德”并不合适。

而这似乎也让记者感受到某种或许很难存在于今天的“净手焚香,读书养气”的诗意氛围。

科普达人

“所有的孩子都是天才,但长大后很多人都变成了庸才,是谁偷走了他们的想象力?”杨鹏总是在问自己。

找回有故事的童年

■本报见习记者 吴益超



吴益超摄

“我的爸爸本来跟你们的爸爸一样平凡,可是妈妈认为爸爸没有出息,爸爸在妈妈的责骂声中越变越小,最后成了铅笔头那样的小人。妈妈把这个小爸爸派给我,监督我的学习,我只好把他装在口袋里,整天带在身上。没想到小偷把爸爸和钱包一起偷走了……”

——节选自杨鹏《装进口袋的爸爸》

杨鹏的世界,是光怪陆离、用想象力构造的世界。

从福建长汀一个耽于幻想的少年,到今天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儿童文学作家和动画公司 CEO,杨鹏用文字描绘出原本存在于我们童年记忆中的奇思妙想,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出一个“科幻帝国”。

中国作协成员、儿童文学博士李学斌对杨鹏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述:“他总是试图透过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来俯瞰现代人迷乱的生活空间,也试图在童话中,以儿童的想象和稚拙,来寻求现实人生的答案。”

埋下科学的种子

杨鹏今年已有 41 岁,但小读者和动画行业圈中人更喜欢称他为“鹏哥”。而杨鹏在此前的一篇报道中,说自己的心理年龄只有 14 岁。

记录想象力碎片是杨鹏的习惯,“上大学的时候,我总是在宿舍里各处贴满随时产生的想象。”杨鹏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若干年后,杨鹏在博客中回忆写作时的状态:“当我的手指触到键盘的时候,我知道我接触到了整个宇宙——我上天入地的想象,将以整个宏大的宇宙为背景展开,我的心灵,也会自由到无限。”

在他的笔下,时间可以停止,猫会变得比屋子还大,拥有“超能力”的校园少年会同科学家探秘时空谜题。杨鹏用故事吸引孩子,在他们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

“所有的孩子都是天才,但长大后很多人都变

成了庸才,是谁偷走了他们的想象力?”杨鹏总是在问自己。2007 年起,杨鹏在全国多个城市组织了“幻想中国,书香校园”活动,这是他的某种尝试,希望借此为下一代“保护想象力”。

“获奖专业户”

随着写作的深入,杨鹏认为表现想象力并非只有文学一种形式。2002 年,他迎来转型,投资成立“杨鹏工作室”,这是国内首个以流水线方式创作儿童文学和科幻作品的作家工作室。两年后,“北京杨鹏原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但要使自己的动画产品,在当时并非易事。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许多中国动画片在艺术上都达到相当的高度,如《大闹天宫》。但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动画却不断衰弱——青少年最喜爱的动漫作品绝大部分是日本和美国的,原创本土动漫几乎毫无影响力。

同样是从 2002 年开始,《影视动画业“十五”期间发展规划》等一系列关于重振国产动画产业的文件相继出台,无数动漫从业者开始期盼中国动漫的春天。

杨鹏就是这场“动漫突围”战役中的佼佼者,至今仍有不少动画从业者对这位作家在动漫产业中取得成功表示惊讶——由于他组织创作、参与编剧、投资拍摄的一些动画片获了不少国际国内的奖,使得杨鹏在圈内被称为“获奖专业户”。

或许这种成功正得益于杨鹏的冷静:在创业初期,他走的每一步都十分谨慎,并仔细琢磨如何贯彻自己的意志、维持资金运作和寻找最佳经营模式。

“商场如战场,企业的成功,与战场上将领的成功一样,一将功成万骨枯。而充当‘万骨枯’的人,必是盲目的人、笃定的人、非理性的人……”

现实离童年有多远?

2005 年,杨鹏一篇《类型化:中国儿童文学的强大之路》的文章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他认为,儿童文学不仅仅是文学,还是一项产业,应该发挥其经济效益。这种与传统“纯文学”式创作大相径庭的理念,自然很快引起学界讨论。

时光荏苒,文章中的一些预言已成今日之现实,儿童文学的天然经济优势也日渐被人们发掘。但杨鹏仍十分感慨:“在商业化洪流的裹挟下,研究者们越来越‘现实’,所谓的‘评论’与‘研究’,正在成为许多研究者获取名利及商业话语霸权的工具。”

有人说,写作与动画的运作,使得杨鹏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但杨鹏却说,自己过的正是最不“商人”的生活——每天保持千余字的写作量,参加文学创作研讨会,有空就上学校作文学讲座。

相比于此,他倒更愿意相信童话的力量。1992 年是杨鹏写作收获的一年——他的作品《坠入爱河的电脑》获中国科幻界最高奖银河奖。而到研究生毕业时,杨鹏就已是包括“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多项国家级以上大奖的获得者,还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一些出版社抢着要这个“未来之星”,但“视自高于一切”的杨鹏,看中了一家月薪只有 400 元、却能当“时间贵族”的研究单位。

所有人都不好看这份工作,但杨鹏再次选择了相信童话的力量。两年后,他就依靠稿费买房子,这在当时的北京作家圈里引起了轰动。之后他又依靠稿费办工作室、办公司、出国、拍动画片……

“我发现童话是真的——只要你的心足够虔诚,并全力以赴地去做,你的愿望总会实现。”杨鹏的童话还在继续,文章开篇那个被装进了口袋里,却爱发明创造的爸爸,如今已经成为众多“90 后”、“00 后”和“10 后”的偶像。而如今这套书已有超过百万册的销量。而最后,“妈妈”变成了和“爸爸”一样小的人,“我”发出了“小大人”式的感叹:这样的日子可怎么过?

读罢这段文字,回望童年,我们离它有多远?

女科学家系列报道

海南省乐东县偏僻山村西瓜南繁育种种试验田里,一位年近花甲的女专家正在不停地忙碌,她就是山西省农科院西瓜育种专家、研究员王果萍。

人们说她像“候鸟”,不辞劳苦地南北迁徙,也不停地收获着希望的种子。而她像抚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呵护着每一个即将成熟的西瓜。

从事了大半辈子西瓜育种的王果萍说,培育易于被农民接受、又广受市场欢迎的西瓜新品

种,是她孜孜以求的梦想。

“从杂交授粉,到田间管理、考种鉴定,哪一道工序都不能少,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王果萍对她的育种工作一贯精益求精。

最艰难的要算是杂交授粉——早上植株开花前,必须对已授粉套袋情况逐一复查,所以往往天不亮就得起床下地,踏着田间露水进行检查作业。每当授粉季节,她和课题组人员天天都要持续干五六个小时,晚上很晚才回家。一天下来,

腰酸背痛,整个人身体累得就像散了架。

30 年来,她先后主持选育出西瓜新品种“双抗 8 号”、“农丰 4 号”等十多个瓜果新品种,其中“晋花无籽”、“晋阳无籽”等无籽西瓜新品种填补了山西省这一产业的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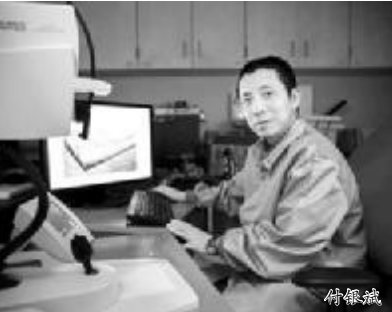
“农丰 4 号”西瓜新品种由于适应性强、品质优良,2011 年获得山西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并在省内外推广 65 万亩,平均亩增收 277.27 元,新增总产值约 1.8 亿元。

种一棚“金瓜”

■本报记者 程春生

为使科研成果惠及广大百姓,实现优良品种和栽培技术相互配套,王果萍还从生产实际出发,研发出数套瓜果优质高效立体栽培新模式,并广泛示范推广。

太原市清徐县南青堆村是王果萍指导的设施瓜果立体高效栽培技术示范村,去年首次在温室大棚示范种植了她选育的“雪甜宝 1 号”杂交甜瓜新品种,仅一季每个大棚收入就达 2.5 万 ~3 万元,村民们兴奋地说:“我们简直是种了一棚‘金瓜’。”



郭孝季 吴迎春

『分子剪刀手』付银斌